

人民党史资料



花 溪 党 史 资 料

第 三 辑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中共贵阳市花溪区委党史研究室编

1991年9月

前 言

《花溪党史资料》第三辑在区委、区政府领导的重视和区党史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对史实的认真搜集和核实，现已整理编辑成书。本辑共收录各个时期史料18篇，其中建国前红军长征过境回忆文1篇。建国后贵筑县时期3篇，花溪区时期12篇，烈士传略2篇。这些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花溪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走过来的战斗历程。

第三辑首篇记叙了红军长征过黔陶的情景。1935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过贵阳县（原花溪区建置）的一些村寨，帮助穷人打跑土豪劣绅，与“干人”结下深厚阶级情谊，播下了革命火种。岁月虽然流逝半个多世纪，然而红军的英名却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建国初期贵筑县开展了大规模的禁烟禁毒斗争，迅速根除了长期残害人民身心健康的烟毒；接着全县从加强税务工作和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入手，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撤县建区后全区又经历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反右倾”斗争、“四清”、精减职工，压缩城镇人口，支援农业第一线等重大运动；全区教育、卫生、档案、保险等事业在区委和区政府的领导下有了较快的发展。

第三辑还追忆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董必武、周恩来、罗毅亲临花溪视察的情景，使我们更加缅怀他们的伟大革命业绩，激励后人永远沿着先辈开辟的革命道路前进。对解放前英勇就义的彭祖年、廖崇美两位英烈的生平和在花溪进行革命活动的史实作了考证和记忆。

《花溪党史资料》第三辑在编写过程中继续得到有关部门和老同志的关心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并恳请对编辑过程中的不当疏漏之处着力指正。

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我们的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并领导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光荣的党。作为党史工作者，我们谨以此书献给党的七十周年纪念日。

编 者

1991年3月

目 录

黔陶——红军播下革命火种的地方·····	(1)
解放初期贵筑县的禁烟禁毒工作·····	(6)
贵筑县的税务工作·····	(13)
贵筑县的交通运输工作·····	(24)
1958年花溪区的大跃进及其教训·····	(36)
花溪区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48)
花溪区的“反右倾”斗争·····	(63)
永不消逝的音容	
——记朱德、董必武、周恩来、陈毅在花溪·····	(73)
精减职工、压缩城镇人口、支援农业第一线·····	(82)
高坡公社“四清”运动的经过与思考·····	(88)
稳步发展的花溪区保险事业·····	(110)
高坡乡的变革·····	(119)
花溪区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	(134)
由贫穷走向富裕的珠显·····	(151)
花溪区日益发展的教育事业·····	(157)
花溪区档案事业的发展·····	(165)
岷峨英烈——记彭祖年烈士·····	(175)
碧血千秋，浩气长存——记廖崇美烈士·····	(185)

黔陶 红军播下革命火种的地方

中共黔陶布依族苗族乡委员会

在花溪区黔陶布依族苗族乡的一些村寨里，只要一提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往事，年过古稀的老人们都会接过话题，很自然地讲起他们当年目睹红军长征过黔陶的情景，并用他们朴实的话语道出一桩桩生动难忘的真实故事。

一、红军是救星

1935年农历二月间，从水场乡一些富户家里传出“共匪要来”的消息，富人们传谣说“共匪进村进寨后，先抢吃的穿的，然后把人畜杀光”。人们对这些宣传半信半疑，有的人家先把好东西藏起来，还拉上耕牛猪羊进山躲避。只有一些老人和小孩留在家中。三月初三上午，一支红军队伍果然由龙里县的比孟场进入黔陶乡所辖的谷洒村和马店村。这里大多数人家早已关门闭户。红军没有惊扰老百姓，他们在院坝中露宿下来，埋锅造饭。农家的院坝，经常都堆有柴草，但红军一根也不动，自己上山拾柴烧饭。村里的一家碾房里，看水碾的农妇见红军来了，慌忙将10岁的男孩藏在水伞洞中，当三个头戴柳圈的红军走进伞洞时，母子二人瑟瑟发抖，不知所措。红军战士笑咪咪地对他们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然后将他们叫回碾房内。天很冷，战士们找来干柴，烧火给母子取暖，还拿出米饭、猪油渣分给母子二人，大家围着火一起吃饭，说也凑巧，寨上徐光文老母亲这天去逝，徐家饥寒交迫，那有钱办丧事，全家人守着母亲

的尸体慙哭。红军战士们见此苦情，对他们说了许多安慰话，还纷纷解囊相助，凑了10多块银元和一些大米给徐光文，嘱咐他好好安葬母亲。

在马店村，有个二十出头的青年田喜生，红军进寨后，他常在红军身边转来转去，对红军的言行认真观察，他觉得红军不是土匪是亲人，是穷人自己的军队。红军临走前，他找到一位红军首长说：“我来报个名，求你们收下，先给你们带路，然后当兵。”可惜小伙子当红军离开家乡后一直没有音讯，乡亲们至今还在惦念着他。

二、翁鸦红军坟

红军经过翁鸦寨时，有两位战士扶着一个生病的红军进寨来，他们把这位生病的红军隐蔽在一家院坝的草堆里便走了。第二天罗瑞元的姑母从龙里县的巩固乡回翁鸦娘家，走到半坡地时发现一具红军战士尸体。回寨后，她把这件事告诉一些人，同情红军的罗明天等人知道后，便将尸体抬到石洞中秘密放置了。1972年4月，王明权夫妇在洞边打猪草，发现洞内红军战士的尸骨完整，便将情况向关口大队党支部反映。党支部查证后于1972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拣出尸骨。8月1日择地7里葬于松林内。当天全体社员肃立于红军坟前，民兵们鸣枪致哀。从此以后，红军坟名扬乡里，每年三月清明，全乡各小学都要组织学生到红军坟扫墓。年纪大的老人也常到这里给孩子们讲红军长征过路的故事。1988年8月1日，区民政局配合乡党委、乡政府重修红军坟。现在，这座红军坟已成为全区教育后代，激励人民前进的纪念地。

三、马场村的红军炮竹声

红军队伍在半坡村猪拱岩密林中躲过国民党飞机轰炸之后，顺着山间小道直下大马场。田里干活的农民们因受到国民党的欺

骗宣传，不明真象，一见到红军部队，便丢下犁和锄，背起娃娃就逃，红军一边走一边喊“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大家不要怕，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是打富济贫的”“我们不会动你们一针一线的，大家不要怕”。红军果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言语亲切，不象凶神恶煞的中央军。渐渐的，跑的人放慢了脚步，胆子小的，还在走走停停，胆子大的，站着看红军过路。红军进到马场寨门边，有个红军战士将一大团炮竹挂在枫香树丫上点火放起来，噼噼叭叭的炮竹声在山间回响，红军战士们还唱起了红军歌曲。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红军战士趁机向群众宣传打土豪闹革命，团结起来，北上抗日的道理。有五个战士还用红土兑水在王光辉家墙上写标语。可惜墙壁年久失修。早已倒塌，红军标语没能保存下来。红军在寨中访贫问苦，在王老奶家，他们见她衣单被薄，就送了五块大洋，嘱咐王老奶去做两套衣服，买床棉絮。王老奶手捧大洋不知说什么好，眼圈红红的，好一阵才声泪俱下地说了一声“多谢”。在以后的岁月里王奶奶时常惦念红军，在她谢世时人们从她微弱的声音中还听到“红军……红军”的呼唤声。

四、骑龙留下个小红军

经过骑龙寨的红军队伍中，有一些女兵和年幼的小红军，由于长途跋涉和沿途与敌人作战，他们非常疲惫，当时，有一位14岁的小红军赖茂春，实在走不动了就靠在周三奶家的柴堆边休息。好心的三奶十分怜惜这位战士，将他收留下来，周家对赖茂春关怀备至，给他找药并治疥疮，让他躲藏养息。红军走后，国民党“清乡队”就挨家逐户地搜查。一天，赖茂春正在灶边烧火煮饭，门外传来狗叫声，两个背着铁筒枪的乡丁穿过院子向灶房走来，要出灶房已经无路，周三奶急忙拉过一捆松毛，将小红军推到灶角用松叶盖上，三奶又故意把灶房弄得烟雾弥漫，乡丁在门

口探头看了一阵，没发现什么，周三奶急忙招呼他们到堂屋去坐，乡丁又到内屋及楼上瞎看了一阵就走了。过了三四年赖茂春长到十七、八岁，成了一个壮小伙，老人家又托人介绍他到栗木寨一家地主家去赶马求生活。1946年，贫农杨国章做媒，好心的谢绍成把自己的长女谢淑珍嫁给赖茂春。贵州解放后，赖茂春被选为骑龙寨第一届贫农下中农协会主席，他积极工作，土地改革运动中，带领群众清匪反霸，分到地主家的瓦房三间，土地耕牛与农具，不久又提任乡信用社主任。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赖茂春调任青岩公社黔陶管理区党委副书记。1962年赖茂春携家返回原籍江西。1982年，时隔20年之后，当年的小红军又返回骑龙看望乡亲们。他告诉乡亲，家乡政府对他十分关怀，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他一家靠科学种田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五、捉住母老虎，吓跑活阎王

红军由骑龙寨进入赵司寨时，正逢这里赶集，方圆十里八寨的各族人民及龙里、青岩、定番（惠水）来的客商云集赵司，赵司场十分热闹，红军一进村很快就了解到人称“母老虎”的地主婆最坏，决定给她一点惩罚。一队红军进入“母老虎”家的朝门，两位战士走上堂屋从太师椅上将她拖到场坝的土地庙前，令她向群众低头承认欺压百姓的罪恶，“母老虎”又凶又恶故意耍赖，红军战士在她的屁股上给了几枪托，用枪比着她的头，当众揭露她剥削农民的罪恶，这只“母老虎”终于吓软了，只好面对群众说：“长官先生们、各位民众们，我有罪、我有罪，饶我这一次吧，今后我再也不敢了……”。红军勒令她将几百斤大米，30多块腊肉分给穷苦的百姓。红军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参加革命闹翻身。“母老虎”被斗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各寨子群众无不拍手称快，50多年过去了，当年分到大米和腊肉的老人们至今仍记忆犹新，他们感激红军，也怀念红军。

从孟关牛打场过来的另一路红军，由河西小路经黔陶直上打铁寨后山大坡顶休息。黔陶乡乡长，恶霸蒋恒昌将红军误认为是中央军，立即叫家里奴仆打扫客房，摆好烟盘烟枪，还令乡丁将青天白日旗插上乡公所房顶。红军见了非常气愤，派出三个荷枪实弹的战士走进乡公所，其中一个爬上房顶，将旗带杆一齐扔下房来。蒋恒昌吓得大汗直淌，以为部队要来包围乡公所，连忙带了狗腿乡丁从后门躲进后山密林之中，十天后才敢回家，其实，红军当晚就进入青岩镇的歪脚村。一个小小的举动，把活阎王吓得三魂掉了两魂。

50多年过去了，红军走过的山道而今已是宽敞的公路，党的富民政策彻底改变了昔日贫穷落后的山村旧貌，在当年烈士倒下去的地方，火红的杜鹃花正开出鲜艳的花朵，人们没有忘记这片当年红军走过的土地，这片红军播下革命火种的地方——黔陶。

执笔：文家强

解放初期贵筑县的禁烟禁毒工作

花溪区公安分局

鸦片是150年前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用以掠夺我国社会财富、摧残中国人民身心健康、削弱民族精神的毒品。贵州省有鸦片的历史可追溯到清道光年间。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腐朽政权的纵容下，贵州民间种植鸦片和吸食烟毒者逐年增加，使全省百业萧条，民不遘生。贵筑县由于地处交通要道，又与清镇、开阳、平坝、长顺、惠水、龙里、修文诸县相毗邻，使其成为毒品进出贵阳的集散要道和烟毒泛滥的重灾区之一。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贵筑县，鸦片烟毒普遍流行于民间，在“寓禁于征”的口号掩护下，大批鸦片公开运销，加上广泛种植，使烟毒流行日益严重，仅本县与附近各县毗连地区的烟农就有382户，1608人，种植面积284亩，产烟土2827.7市两。这些种烟者中有地主10户，53人；富农42人，198人；中农127户，575人；贫农176户，697人；雇农26户，79人；自由职业1户，6人。①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当时种植大烟不仅面积大、地域广，而且户数多。据1950年剿匪结束时的不完全统计，只要有10户以上的自然村寨，就有开设烟馆者，尤其在场、镇最为突出。孟关场共有189户人家，其中大小商户70多家。这些商户中，有39户开设烟馆，40户附带经营鸦片，开设烟馆和经营鸦片的70多户竟占该场总户数的42%。据解放初期贵筑县各区不完全统计，全县吸鸦片的人数约占全县总人口的25%左右（当时全县共有145,507人）。这25%还仅指有瘾烟民，一般偶尔抽一点而无瘾者尚不计算在内。

1949年11月15日贵筑县解放。针对当时严重危害群众身心健康的烟害，县人民政府于1950年初颁布了在“全县范围内禁止种植、贩卖和吸食大烟”的禁令。禁令颁布不久，县境内就发生土匪暴乱，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工作中心遂转向剿匪，当时人心不稳，加上国民党溃退时散布“解放军允许种大烟”等谣言蛊惑，虽经严禁和宣传教育，但全县种植大烟和吸食鸦片的情况仍然十分严重，1950年，孟关乡种植大烟的面积约占该乡田地面积的7%以上，今五星村的大路两旁当时都种植了大烟。

针对实际情况，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政务院、西南军政委员会及贵州省人民政府颁布的禁烟禁毒命令，于1950年在全县展开大规模禁烟禁毒工作。3月在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上传达并解释了贵州省、贵阳专区有关禁烟禁毒政策和布告，经与会代表讨论并形成“贵筑县禁烟禁毒工作决议”。在县召开的区长、区书联席会上，也将禁烟禁毒工作作了专题布置，强调这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要求各区把禁烟禁毒工作列为一项任务认真抓好，同年12月21日在第三届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进一步对禁烟禁毒工作形成决议，要求全县人民禁种、禁卖和禁吸鸦片。由于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重视，将禁烟禁毒工作同“五大任务”、土地改革“三反运动”等结合起来，使整个工作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经过三年努力，到1953年全县基本禁绝了国民党政府几十年没有办法禁绝的烟毒。

贵筑县解放初期的禁烟禁毒工作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

一、宣传禁烟禁毒政策，教育、发动群众自觉根绝种烟，打击和取缔烟贩、烟馆

根绝种烟，是禁烟工作的首要任务。中共贵筑县委在取得剿匪斗争胜利后，在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五大任务的同时大力查禁烟毒。依靠农民协会，发动群众，将禁烟禁毒变为

群众的自觉行动，协助政府打击烟贩、取缔烟馆，根绝种烟。据《贵筑县三年禁烟禁毒工作总结》记载：1950年12月底，共查获烟具、烟枪3000多套，其中白云区收缴590套，水田区收缴500套，金华区狗场收缴400套，石板区场坝收缴700套，孟关乡收缴400套，青岩、花溪两镇收缴600多套。查获的烟具，利用赶场天当众焚毁。同时，群众还到县人民法院检举开设烟馆、运输和贩卖鸦片的案件37件，涉及53人，人民法院及时依法进行了惩处。共没收鸦片554斤，烟水半瓶，烟具37套。这些成果大大地鼓舞了群众参与禁烟禁毒的热情，坚定了信心和决心。1952年经检查全县没有发现种烟情况。过去与龙里、平坝、开阳、清镇等县结合部大片种植鸦片的情况也得到控制，烟毒来源逐步缩小，烟民逐步断绝毒品来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颓废风气逐步得到扭转。

二、惩治贩毒要犯，教育一般烟民

虽然1951年底贵筑县就基本根绝了种植大烟的恶习，收缴了县境内绝大部份鸦片和烟具，但一些不法烟贩为了赚钱，又利用贵筑县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偷偷将鸦片由安顺、平坝、织金、开阳、清镇等县运入贵筑，再流入贵阳；或从贵阳经过贵筑将白面、膏精扩散到邻县。据《1951年1月至4月26个烟毒案件的统计分析》记载：这一时期贵筑县人民法院受理的26起烟毒案件中，10起是由织金经贵筑五区狗场，1起是由平坝经贵筑，8起是由安顺经贵筑偷运输入到贵阳的，2起是由贵阳返运至花溪的。据贵筑县公安局《1951年3月至6月本县第五区查获烟毒统计》报告记载：“本县第五区狗场乡在1951年3月至6月的3个月内，就查获鸦片2183.75两，烟具88套，糟达47两，膏精12两。”这些案件的80%都是由妇女、儿童查获的。由此可以看出人民政府对烟毒的宣传和颁布的禁烟禁毒令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人民自觉地向贩烟、贩毒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对于烟贩，各级政府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党的政策和不同情况进行恰当的处理。对于禁令颁布前的烟贩，只要他们在禁令下达后认真改正错误，则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于一贯贩卖大量烟毒，开设烟馆，拒不改悔的惯犯，则坚决给予沉重打击。第五区朱昌乡的彭仲益是当地一个大烟馆业主，普定人龚应昌也是串入贵筑县的大贩毒犯，由于犯罪情节极其严重，经公安机关抓获后呈报上级批准，分别在狗场、花溪召开公审大会后立即执行枪决。

三、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加强禁烟禁毒的组织领导。

为了把禁烟禁毒工作持久地开展下去，1953年成立了贵筑县禁烟禁毒委员会，委员会由14人组成，主任陈和义（副县长），副主任贺克诚（公安局长），委员岳万学（团县工委书记）、马庆云（县妇联主任）、任良臣（卫生院长）、任敬位（民政科长）、许家荣、王毓华（许、王在工商联合会工作）、杨德新、戴顺清、刘启志、韩志民、郑昆、陈尔福（杨、戴、刘、郑、陈五同志均是禁烟禁毒活动中的积极分子）。

县禁烟禁毒委员会成立后，结合“三反”运动，进一步宣传贯彻禁烟禁毒政策、法令，经过一段时间艰苦工作，不仅教育了干部和群众，还在群众的帮助下清除了一些隐藏的不法分子。县贸易商店会计张某某、法院干部刘某某、建设科办事员赵某某等一批不法分子，就是在群众的帮助下查出来的。禁烟禁毒委员会用这些典型作反面教材，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认识。

四、抓好重点场镇的禁烟工作

鸦片的贩运与销售有一个特点，即最易在交通方便的集镇、乡场落脚，其原因是这些地方易于集散，又便于招来烟客。针对上述特点，根据贵阳专署公安局长会议精神，结合贵筑县的具体

情况明确花溪、狗场为全县工作重点。抽调党团员积极分子20人组成禁烟禁毒工作组到两地开展工作。为了便于活动，工作组下设材料、审讯小组和办公室结合检查生产、掌握情况。经两个月调查，基本摸清了情况，如花溪镇查出大、小烟贩110人，其中万两以上的3名，5000两以上的8名，1000两以上的18名，500两以下的14名，100两以上的15名，100两以下的52名。

工作组根据掌握的材料，按性质和情节轻重作了不同的处理。对大犯、主犯，政治面目不清、群众反映强烈的，在事实确凿的基础上，由县公安局逮捕34名，其中32名为贩毒犯，2人为破坏禁烟禁毒运动的现行犯。为了大造声势、扩大影响，教育群众，逮捕采用开大会的方式分三批公捕。在公捕会上，工作组向广大群众宣传贩卖烟毒是帝国主义者摧残毒害我国人民身心健康的一种手段，禁毒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也是转变社会风气的社会改革运动。说明被捕的烟贩都是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颁布禁毒令后仍然继续贩毒，危害人民的罪犯，为确保人民身体健康，防止烟毒蔓延，必须对他们依法制裁。这些贩毒分子，经侦讯查实，最后被判刑11名。其中判15年的1名，8年的2名，7年的2名，6年的1名，5年的1名，4年的1名，3年的3名。教育释放2名。

在打击首恶的同时，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先后由花溪小学、花溪农会组织两个宣传队，分别在5次干部会、16次积极分子会、3次烟贩家属会（其中也有烟民）、3次群众大会上（共约800人）开展宣传教育。群众提高觉悟后，检举了57名烟贩和14家烟馆。122名烟民在认识提高后自动到民政常登记戒烟；33名烟贩交出烟土148两5钱8分，烟具37套，表示悔过自新。有的烟民还以自己所遭受的烟害控诉烟毒给自己带来的不幸。花溪镇新民路周某某说：“我生了10个小孩，大的已经10多岁，小的还没有满月，由于我做生意得的钱只顾抽大烟，不管家庭的生

活，弄得小孩生了病也无钱医治，结果都先后死掉了，现在我已败落成一个孤寡老，而且一天不吸鸦片就打呵欠流眼泪，连路都走不稳。为了吸毒，我落得倾家荡产，丈夫离去。如果不吸大烟，哪里会落到这样悲惨的地步！”

五、结合开展大生产运动，进一步教育改造烟民

贵筑县大规模的禁烟戒烟工作是在铲除种植大烟、取缔、查封烟馆、惩处烟贩后进行的。根据贵州省十项农业政策，结合生产进行全面布置。以农民协会、互助组为核心，用“两勤带一懒”的办法，教育、改造烟民，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能力。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戒烟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第三区燕楼乡有60个烟民自带伙食集中在汪家祠堂学习禁毒法令，认识鸦片的危害，经过15天的学习，一般都戒除了烟瘾，愉快地回去参加生产劳动。第五区原有烟民963人，通过开展打击烟贩，封闭烟馆、劝导戒烟后，使他们受到很大教育，一般都戒掉了烟瘾。对于那些烟瘾较大的极少数烟民，则采取由区集中改造的办法，帮助他们戒除。第三区集中18个烟民，劳动教育12天，基本上戒了烟瘾。

由于措施得力，方法得当，全区大多数烟民戒了烟，体力逐渐得到恢复，增强了劳动能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经济收入增加，家庭生活相应得到了改善。他们都深有感触地说：“人民政府对我们比父母还要关心。”青岩镇烟民车某某已吸了50多年的大烟，在戒除烟瘾后对亲友们说：“我满清时代、国民党时代、解放后都吸大烟，从来都没有戒脱过，这次戒脱了。全靠共产党的教育和人民政府的帮助。”

贵筑县解放初期的禁烟禁毒工作，是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禁烟禁毒委员会做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开展政策攻心，并采取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有组织的工作方

法取得的，由于各级党政重视，组织指挥得力，放手发动群众，公安、司法机关有力配合，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抓好典型，以点带面；充分发挥党团员的骨干带头作用，重视培养积极分子；重点抓好禁种、禁运、禁吸等环节；重视教育改造烟民，到1953年贵筑县基本上禁绝了鸦片，净化了社会风气，保护了人民身心健康，促进了解放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执笔 胡宗全 李承龙

注 释

① ② 《贵筑县三年禁烟禁毒工作总结》。